

毕熙燕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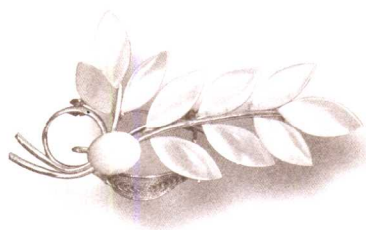


天生作妾

毕熙燕

天生作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生作妾/毕熙燕.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

ISBN 7-5321-2339-1

I.天… II.毕…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907 号

责任编辑:魏心宏

封面设计:周志武

天生作妾

毕熙燕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74,000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2339-1/I·1874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描述五个女人不凡命运的小说，第一个女人，人们只知道叫他“四奶”；第二个女人，在外人看来应该是四奶的二媳佩珊；第三个女人，是作为佩珊的女儿、却和四奶更亲的小六；第四个女人，是小六的洋婆婆洛丝；第五个女人是洛丝的童年好友芭芭拉。这五个女人来自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接受的是高下悬殊的文化教育，又各自走出了一条富有独特意义的生活道路。四奶是中国旧时代的传统典型，佩珊算得上是中国最早一批新女性，小六是开放改革时期走出国门的留学生，洛丝是移民澳洲的二战犹太幸存者，芭芭拉是匈牙利纯粹的贵族后裔。然而，在核心人物小六的思维探索之中，她们相互映衬、殊途同归。

本书通过描写这五个女人各自的理想，她们的理想及其命运之间的冲突，以及她们相互间直接间接的矛盾、和有形无形的影响，展示出东西方妇女命运中的一个共同的、无法摆脱的悲剧事实：天生作“妾”。通过每个人物不同的生活经历和背景，本书还试图向读者揭示造成天下妇女这一悲剧的自身的和外在的原因。

本书的背景、时代描写，根据人物的变换跨度很大。从中国到欧洲、再到澳大利亚；从二十世纪初期，到接近世纪跨越。在结构上，本书以人物划分章节，每章重点描写一个人物，同时引出她人事迹、并造成悬念。这样，每一章既是一个独立成篇的故事，又与其他章节互为补充。



毕熙燕，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及研究生毕业。出国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1990年移民澳大利亚。现在悉尼大学中文系任教。

毕熙燕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里研究深造和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同时，坚持她的中文写作。1996年，她的长篇小说《绿卡梦》由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1998年，她与另外几位女作家合作的中短篇小说集《她们没有爱情》由悉尼墨盈创作室出版；2000年，她与刘海鸥合著的短篇专集《桥上的世界》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1997年和1999年，毕熙燕两次赢得了澳大利亚国家艺术委员会颁发的文学创作基金奖。

关于

天生作妾

代序

《天生作妾》的写作，是我在“不惑”的年龄段里，作为一个“过来人”，对女人命运的一个思索。我之所以敢做这么一个似乎是“大而无当”的思索，首先是因为我的母亲给我在这一主题上留下了无数疑问和想象。我的父母都出生在富有的、书香弥漫的家庭。但是从文化的角度讲，两个家庭的背景却有着很大的差别。父亲的家是传统保守的农村大户；母亲的家则是相对文明开化的城里士绅。父亲家的书香来自于四书五经；母亲家的则充溢着西方色彩。两人因为对音乐的爱好走到一起，但一个好的是京胡，一个爱的是钢琴。母亲给我留下的形象是整洁、利索、言语作派充满知识分子气质；父亲则邋遢、无序，身为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完全接受城里的生活习惯。不仅如此，父亲有过两次婚姻，出于某种原因，母亲和另一个妻子都具有合法地位。父亲虽然一直同母亲生活在一

起,但也从没断了另一边的来往。这一切对我的母亲似乎很不公平。可母亲却对父亲从一而终,而且对他很尊重。据说母亲的娘家对父亲很看不上眼,可母亲却总是站在父亲的一边,维护、周旋。她在孩子们面前也如此,文革中,我的一个哥哥因为出身不好在学校受了委屈,回家诉苦说:都赖我爸,当了右派连累子女。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幽幽地说:这话要让你爸听见了,该多伤心哪!

母亲死得早,使我没机会了解她的内心世界。但当我把一些记忆的片断组合在一起时,我感到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举两个例子:有一次家里大扫除,我发现了一些旧照片,其中一张是母亲。她大概也就是二十多岁,穿一件很华丽的旗袍,披着长长的、卷曲的黑发,斜倚在门框上,时髦美丽极了。我想等扫除完了问她,可一转眼,照片就不见了。待我问母亲照片放哪了时,母亲竟说她根本没见过,而且也不记得照过这样的照片。还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了母亲的一本旧日记,上面有一首诗,第一句是:“负屈含冤已六年……”我后来在母亲面前提起这句诗,她断然否认,而且对我很生气。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看到她过去的形象,更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写的那首诗,还有那含了六年、而且无可置疑地继续含了下去的冤屈到底指什么。母亲病倒时,我不到十五岁。记得她有一天用哀哀的眼光看着我说,等你长大了,可别走我的路啊。十五年之后,当我陷在一种不很正常的感情里难以自拔时,一个哥哥说了一句:你在感情上怎么那么像妈。我才重新记起、并有所理解母亲的这句话。随着我在感情上日益成熟和稳定,我想了解母亲的内心世界的愿望也就愈加强烈。

除了母亲之外,我“奶奶”是第二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

她是父亲老家一位亲戚的二房太太，解放后到北京帮佣谋生。我和哥哥们都爱她、叫她“奶奶”，但对待她却不像对奶奶那般尊重。我从没有想过她会有什么喜怒哀乐。她是个好主妇，我曾问过她为什么没再结婚，她说，嫁过人了；她喜欢孩子，我又曾问过她自己有没有孩子，她说有过，死了。仅此而已。可有一件事我总也忘不了。文革中，家里怕出事，把她送回老家躲一躲。走前，她悄悄地给了我一只戒指，跟我说，这戒指跟了她一辈子，收好了将来有用。我如今已不记得那戒指是什么样子的了，更不记得我是怎么把它弄丢的。只记得几年后，当我们把她从老家接回来时，她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戒指还在不在？我说丢了，她脸色茫然。从小到大，我们干了什么错事，她都不但不说我们，而且找理由为我们开脱。但那一次，她沉默着走开，无声地谴责了我。若干年后，我奶奶死于中风。中风的原因是找不到一件东西。这么多年来我总在想，那只戒指背后是个什么故事呢？她在寻找的意念中死去，和这只戒指的丢失有没有关系呢？

我的洋婆婆是第三个促使我写作这本书的女人。最初，我对婆婆的印象有点失望，觉得作为一个经历过二战希特勒的大屠杀，经历过战后移民的艰苦生活及两次丧夫之痛的人，她显得过于简单而无主见。然而，随着我同她接触的次数越多，我发现这种印象未必准确。尽管每当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不论大小），她都显得六神无主、四处求援，有时甚至接二连三地半夜把越洋电话打过来，逼得她儿子对着话筒咆哮一番，但到了关键时刻，当我们还因想不出辙来而干着急时，她在彼岸已经果断地作出决定。婆婆来澳洲前后四次，每次来都不怕麻烦地带着一个不算小的镜框，里面是一个年轻女子在拉小提琴。丈夫说那只是一幅家中的老画而已。我却经常发现

婆婆面对这画出神，偶尔还会悄悄地抹一把眼泪。而问起她来，则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回答。去年我们到加拿大看她时，她正好住进了医院。我和丈夫给她送衣物，我特意把这幅摆在她卧室的画带了去。婆婆喜出望外地接过去，摆在了病床边上。谢了我好半天。我可以断定，这幅画的背后是一个绝不简单的故事。我还认定，我婆婆及那一代被战争摧残过的女人都在心里存留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她们不说，难道我们就该忘却吗？

就这样，我有了对女人的命运作出思索的欲望。而且，我从以上这三个背景、文化、出身、经历都很不同的女人能不约而同地引发出我的相同取向的联想这一事实，感到了这种思索的可能性。于是，我试图以我的经历和感受去还原她们的生活。我从她们生活中都具有不能或不愿告人的秘密这一共性上，强烈地意识到人、特别是女人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接受意识、及她们为了现实中的平衡而顽固维护的某种与现实生活可以形成对比的美好的记忆或幻想图像。我从而找到了“天生作妾”这一思索的切入口。这里的妾字是不能直译的，它是“逆来顺受”这个概念的形象化的解释。而这个“逆来顺受”不是指对某一个人，而是指人对命运的服从。这种服从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服从的程度有时候深、有时候浅。但服从却是无一例外的。

在我看来，天生作妾这样的被动接受意识，不分男女，存在于每个人的性格之中。我选择了五个女性来展示这种意识，一是因为自己也是女性，写起来更加熟悉；二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及社会文化的种种因素，这种被动意识往往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深刻。而既然这种被动意识是人的共性，我感到

最重要的是通过人物的塑造去发现人是如何在这种被动意识的驱使下在自己的生活误区中越陷越深的,而不是去评价其对与错。于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消掉我的个人见解,让这些生活在不同误区中的女人各说各的话。这也许能从“惺惺相惜”的角度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有点贡献吧。

出于同样的考虑,我在构思时没有采用我上一部长篇《绿卡梦》里用的那种几条线索同时并进的傳統结构方式。《绿卡梦》是通过几个中国人和澳洲人的故事展示九十年代初期留学风潮的历史文化影响,重点在事件;而《天生作妾》是通过对五个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女人的婚姻悲剧揭示人的心理误区,重点在人物。我便采用了以人物为章节的谋篇方式。每一章像是一篇人物的传记,其他人物作为陪衬出现其中。章与章之间互相补充。从而使人物之间的逻辑联系越到后来越清晰。而由于小六是使这五个人串联起来的关键性角色,故她的故事铺得最开,并放在最后。我这么做,还和我的一种很坏的读书习惯有关。我读大部头小说时,常常为了尽早地知道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结局,前后跳着看,这跟我的急性子自然不无关系。我想,天下急性子的人不只我一个,而且随着社会生活压力的日益增大,还会越来越多,这样结构便可以帮助更多的读者拿得起、放得下。

我希望我的努力不只是一种空想,而这当然只能是由我的读者来判定。

作者

2月12日,于悉尼

引 子

我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终于在悉尼一所大学的讲台上，将我那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文学无穷魅力的理想磨灭了。七年里，我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问题。从孔子有没有小老婆？到苏东坡与嬉皮士有什么联系？再到孙中山是不是蒋介石的父亲？我精疲力竭、口干舌燥不说，而且开始闹不清是学生无知还是自己的观念有问题。讲起课来便日益有一种强词夺理的感觉。逐渐地，这种感觉还蔓延到了我的日常生活里，我开始对许多事情感到困惑。从起居饮食、到社交举止，我常常手足无措。有时连我写了几十年的中国字都看着笔画不顺。我想，这一定是多年来教书、做学问造成的。这种整日要在对与错之间作出选择的行当使我的判断机制紊乱。我像是一只摆在餐桌上的柠檬，在一双双不同的手的挤压之下，汁液枯竭、畸形变态。我必须想办法把自己重新摆回到汲取的位置上。就这样，在新旧世纪交接之际，我向大学递交了辞呈。躲到了一家图书馆，当起了默默无闻的图书馆员。

我所在的图书馆坐落在离悉尼市中心不远的俄伍德区。这里曾是一片丘陵，地面的高低落差因而很大。图书馆位于中心路口的高坡上，站在馆前的平台上，可以俯瞰到熙来攘往

的汽车,拥挤热闹的超级市场,饭馆、理发店、肯德基、自行车行,还有代表这一区主要居民成分的希腊圆顶雪白色大教堂。一片无秩之美。我们的图书馆归悉尼市政府管,属于百分之百的公共福利设施。它规模很小,仅有两间连着的屋子,中间以我们工作人员的两张办公桌隔开。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面书籍报刊、电脑因特网、复印机传真机,应有尽有。唯一不够数的是来馆借阅的人员。图书馆的门口设有一个进出人员计数器。有时一天下来,计数器上竟只有几十人。来的人里除了做作业的小学生之外,多数是老人。而老人们又很安静,坐在那里互不干扰地看报刊。我们工作人员便很清闲。

尽管馆里的工作一个人干都有富裕,可出于对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考虑,政府安排了两个人。我的同事叫罗伯特。是个三十岁出头的澳洲青年,正处在一场如火如荼的热恋之中。因为爱情的缘故,罗伯特的精神恍惚、心不在焉。

我于是如鱼得水。在这座安静而无干扰的小图书馆里,尽情地从四壁环绕着我的书籍中汲取营养、滋补我那经过七年的付出和挤压而变得既空虚又糊涂的大脑。

可是,同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一样,刚开始的新鲜劲儿过去之后,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找来了。当我的头脑被无数信息填得暴满之后,我的知识消化系统又出现了不适应。我像一个吃多了肉的人对一切肥东西都起腻一样,开始对书感到反感。我盼着罗伯特早点结婚,从而能有心思和我聊聊天;我希望图书馆多来点顾客,好使时间在忙乱之中流逝得快些。我甚至偶尔在枯坐一下午之后,开始领略久违了的寂寞的滋味。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我注意到并结识了伯那德老人。

伯那德是一位看上去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我第一眼看到

他就感到了一种很强的吸引力。那是一个下午，我到对面的希腊小店吃过午饭回来，不想马上坐下，便在两间馆舍的书架前整理那些本来就有条不紊的书籍。于是，在法律架下的书桌上，我的目光落在了这位老人的身上。我当然不是被他的老所吸引，而是他的那张脸，那张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但却白皙而精致的脸，还有那双隐在金丝镜框后面的、依旧清亮有神的眼睛，特别是当它们盯着人看时的那种自信（而且绝无倨傲）。我知道，那是一种文化与修养的象征，而且是很高的文化、很深的修养。老人回望着我，报以一个善意的、略带揶揄的微笑。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么盯着人看不大礼貌，不好意思地向他表示了歉意。就这样，我们攀谈起来。

我的眼光显然很准，伯那德告诉我，他是一位退了休的高级法院的法官。大概是怕我不信，他顺手从架上抽出一本1985年度的高级法院家庭纠纷案例分析。作者，伯那德·富瑞。封底照片上分明是他那张精致的脸，只不过要年轻得多、因而也更富有魅力。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虚荣，我也告诉他自己原本是在大学里作讲师的。我们聊得熟了一些之后，他便开始给我讲一些判案子的笑话，我则回报给他我学生的滑稽问题。谈话轻松、投机，道别时，双方心情都很愉快。从那以后，伯那德每天午饭过后就来，看一小时的报纸，然后就同我闲聊上二十分钟，到放学的小学生来馆做作业时才走。形成了一种很默契的关系。直到有一天，他带着一丝诡秘的笑容说：“我家里其实有自用的图书馆，藏书不比这儿的少。”“是吗？那你家肯定很大吧？”我顺嘴恭维着。可话刚说完，脑筋就转过来了：“那，那你为什么每天都来这儿呢？是为了看报纸？”我问。伯那德狡黠地一笑，又说：“我家订有三份报纸。”“那……？啊，我明白了，你是想找人说话。”伯那德又笑了，

“你只说对了一半。”他抬起头，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是想找你说话。”顿了一顿，似乎是等我的反应，目光更有些肆无忌惮，他又说：“我以前每天散步都经过图书馆，可从没进来过。自从看见你坐在门口桌子的后面，我的腿脚就不听话地老往这儿拐了。”

啊哈！这可真是人老心不老啊。我心里不由得泛起一丝厌恶，同时又感到有些可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伯那德像是看穿了我的思想，他头一抬朗声笑了起来，引得另一张桌上两个看报纸的人直回头看。他边笑边摇头，似乎在说：这位女士，你自作多情了。我觉得有些窘迫，脸上一阵发烧。伯那德笑毕看了看表，站了起来，戴上帽子，拾起手杖，冲着面带尴尬的我说：“不早了，我们回头再聊。”说罢缓慢但不失风度地离去了。

那天晚上，躺在黑暗中，我竟因为伯那德而长久不能入睡。我虽然不会为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恭维而蒙了头，可是他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不论年龄还是地位都大把抓的人，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我是想找你说话”，找我说什么呢？就是那些不着边际、毫无分量的闲话吗？回想着他朗声大笑的样子，我后悔自己过于敏感。他的城府和修养实在是太深了，令我这个自以为深谙世事的人相形见绌。这既使我恼火、又使我感到好奇，我产生了一种了解他的欲望。

我意识到要在他面前运用心计我怕是不够火候，所以第二天我坐在他面前，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想找我说什么？”

“好，你没有让我失望。女人要是想讨人喜欢，最忌讳的就是忸怩作态。”伯那德点头赞许着说。可我却失望了，尖刻地回答说：“你以为女人的直率是为了讨男人喜欢，那可错了。”老人先一愣，继而又笑起来。“好，我的确是没有看错。

你和她不光外表像，连说话的口气都一样。”

“她是谁？”我问。

“她是一个在我家里住过的中国女人，你长得很像她。”

原来是这样！我隐隐地感到失望。倒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原以为多神秘的事情，结果是一点神秘感都没有，白让我费了一晚上的脑筋。我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准备问他一些应酬性的问题，诸如这个中国人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现在在哪儿等等。但是，没等我开口，伯那德却掉开话题，谈起了他自己。

“我是个非常喜欢女人、也一向招女人喜欢的男人。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总是被漂亮女人包围着。我的形象、我的气质，总能吸引她们的注意力。这么说罢，凡我喜欢的女人，从来没有拒绝过我。我先后娶过三位漂亮而有才气的妻子，她们给我生下了五个儿子，我如今拥有九个孙子。可是，你猜我的现状是怎样的？”

“你孤身一人住在一所空荡荡的大房里。”我不喜欢男人在女人面前显示优越，便故意往坏里猜。

“你说得太对了。”伯那德不但丝毫不介意我的态度，还赞许地拍了下桌子，一本正经地讲下去。

“我的三个妻子全都同我离异，我的儿子们都跟母亲更亲近，我的孙子们很少想起来看我。曾有一段时间，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我是个对女人一向很好的人。我心细，知道怎么讨她们喜欢。我会说一些既不肉麻、又使人感到体贴的好话，还懂得买那些令女人兴奋的小东西。我的三个前妻当初都为此爱我爱得发疯。可后来却宁愿自己单独生活、过苦得多的日子。这是因为什么呢？”

“十五年前，我的第三位妻子离开了我。我当时并不太在

乎。我虽然已经退休了,可一点也不寂寞。我外边有无数的社交活动,家里也总少不了客人、特别是漂亮的女客人。”伯那德说着冲我不无轻浮地眨眨眼。我有点烦了,既觉得他的开场白绕的弯子太大,又不爱听他在女人问题上的自我吹嘘。便敷衍地说:“那好嘛。你又有自由、又有福气。”说着起身环顾四周,表示我得去干点工作了。

“你别急,我下面要说的就是你爱听的了。”老人抬头看着我,眼中第一次流露出一种企求。我向四周看看,一个顾客在一角看杂志、另一个在用电脑。此外便是罗伯特抱着电话一副论持久战的样子。我的确也找不到借口离开,便重新坐了下来。

“岁月不饶人哪!我逐渐地感到力不从心。我与外界开始疏远,人们也逐渐把我忘掉。我尝到了寂寞的滋味。于是,我开始招租客人。我的目的当然不是钱,而是一个能偶尔说说话的人。我的房客换了一个又一个,从未尽遂人意。直到小六搬了进来。”

“小六?”我一愣,插嘴问道:“谁是小六?”

“她就是那个很像你的中国女人。”

“她?她也叫小六?不对吧。那她姓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她就叫小六。我觉得这名字好极了。”伯那德老人加重口气说。

“可你知道,小六不是正经名字。我们中国人……”我穷追不舍地欲同他解释,一群放了学的小学生带着喧闹走进来。围在办公桌前要我们帮着查资料。我和他的谈话只好告一段落。等到小学生们个个满意地离开了,伯那德老人也不在了。盯着他的空位子,我发现自己的胃口已被调起来了。讪讪地

走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一直到关门,我不论做什么,都需要不时地把脑中出现的、跟伯那德有关的联想赶走。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老头已拥有了我全部的注意力。

“小六长着一张圆脸,上面笼罩着一层忧郁。就像你现在的样子。”伯那德第二天开门见山地同我说起这个小六。“她很有教养,言谈举止得体适度。我想说话时,她准在旁边,而我希望不被人打搅时,她无声无息地好像不存在一样。我老了,好犯脾气。有一天我想听肖邦的钢琴曲,怎么也找不到那盘CD。我气得把桌上的书报全划拉到地上。小六听见了,走进来先帮我把东西都收好,然后,唉,你想不到,我的客厅里有一架钢琴,是第二个妻子留下的,小六走过去坐下来,居然弹起肖邦来。弹得真是好啊!”伯那德说着,脸上泛起暧昧的微笑。“我见的女人多了,可小六那东方女子的魅力,哎!这么说罢,我当时真希望自己年轻几十岁。就这么鬼使神差地,我对她讲起我过去的生活,就像我给你讲过的一样,不过要详细得多。

“我看得出来,小六对我对待女人的态度有反感。不过,她毕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所以没有像你那么不客气。”伯那德半开玩笑地把话题转到我身上。

“这个小六是做什么的?她受过什么训练?”我插嘴问道。

“啊,我没跟你说过小六是心理医生吗?对不起,小六在一家康复中心工作。她是在澳大利亚读的学位。是她母亲把她送出来上学的。她母亲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小六说她母亲是中国女人里最早拿正式大学文凭的人。很可惜呀,一辈子受委屈。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人有的时候太超前了,会被环境所不容啊。尼采不就是因此而被逼疯了吗?”

伯那德的话题岔得太远了,我用手轻轻点着桌面说:“嘿,